

要说近期最出彩的文物门类,那就莫过于铜镜了。先是去年11月,“镜里千秋——中国古代铜镜文化”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,使国博成为铜镜爱好者的打卡圣地。今年4月,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又推出“万物毕照——中国古代铜镜文化与艺术”展览,为清华110年校庆再添文化风景。日前,大唐西市在海口举办的2021年春拍的6个文物艺术品拍卖专场中,铜镜又独占两席。古铜镜以其独特的古韵和纹饰之美,成为人们关注的文物新热点。



安徽省文物考古所藏战国六山纹铜镜。

铜华照青丝

铜镜的镜面光洁,最实用处当然便是照面。正所谓“对镜贴花黄,弄妆梳洗迟”,闺中佳人弄妆画蛾眉,少不得一面湛光如许的铜镜。东晋顾恺之的名作《女史箴图》中就有魏晋女性对镜梳洗的画面:左侧一贵妇端坐于席上照镜,身后有一女侍为其梳头,镜台高立,其上置一圆形铜镜。右侧的女子左手执镜,右手对镜自理,镜中可见其侧视的清秀面容,那种顾影自怜的神态尤为写神。照镜弄妆的妇人们优雅淑娴,姿态端庄,充满魏晋女性闺房的生活气息。

除却《女史箴图》中出现的圆形镜,中国古代铜镜的样式还有菱花形、菱花形、方形、桃形、钟形和瓶形等多种。像江苏仪征市博物馆所藏的唐“千秋”铭双鸾瑞兽花鸟镜就是八瓣菱花镜的代表,匀致的整体布局,对称的画面中又略有变化,这样一面形制和纹饰都颇具艺术品位的铜镜,其主人想必应是达官显贵的家眷。

闲话古铜镜

古镜故事多

除却照面器用,铜镜在古代还有着深刻的文化寓意。像《旧唐书·魏徵传》中唐太宗就曾以镜作过类比:“夫以铜为镜,可以正衣冠;以史为镜,可以知兴替;以人为镜,可以明得失。朕常保此三镜,以防己过。今魏徵殁,遂亡一镜矣!”。另外像成语“明镜高悬”又名“秦镜高悬”,源自古代的民间传说:晋葛洪《西京杂记》中记有汉王刘邦进入秦咸阳宫时,见到过一块奇异的方镜,“广四尺,高五尺九寸……以手扪心而来,则见肠胃五脏;人有疾病在内,则知病之所在;如女子动有邪心,则胆心动。秦始皇常以此镜照宫人,胆心动者则杀之”。这面秦镜有此异能,后来“秦镜高悬”就被用来比喻官员判案廉洁公正。有关铜镜最跌宕起伏的故事莫过于“破镜重圆”了,此典故出自唐孟棣的《本事诗·情感第一》:南陈后主陈叔宝的妹妹乐昌公主,才貌双全,下嫁太子舍人徐德言为妻。后来隋灭陈,俘虏了陈后主的嫡妃、亲戚,其中便有乐昌公主。由于隋朝大将杨素破陈有功,隋文帝便将乐昌公主赐给杨素做小妾。陈国将亡之际,徐德言曾将一面铜镜劈为两半,夫妻二人各藏半边,约定假如他们分散,就在每年的元宵节,拿镜子到市场上去卖,以求重逢。后陈国灭亡两人分散后,公主派老仆拿铜镜去市场上卖,结果真遇到了徐德言。杨素倒也大度,被他们夫妇二人的真情感动,便将公主还于徐德言,并赠资让他们回归故里养老。铜镜此后也成为爱情坚贞的象征。在一些考古发掘中,还出现过丈夫的墓与妻子的墓各出土半面铜镜,并可拼合完整的情况。所以铜镜的“破镜重圆”不仅是书里的故事,还成为古人逝后浪漫爱情的见证。



宋“湖州石十郎真炼铜无比照子”铭文镜。



大英博物馆藏顾恺之女史箴图卷(唐摹)(局部)。

纹饰之美见时代变迁

博物馆中的铜镜多以镜背示人,缘于其正面素洁,并无太多观赏性,而背面则有反映其时代特色的纹饰和铭文。春秋以前的铜镜多是以几何形的纹饰为主,如七角星纹、叶脉纹和弦纹等。战国时期中国铜镜迎来第一次高峰期,像其中的山字纹铜镜最具特点,已发现的有三山、四山、五山和六山之别,其中四山纹较多,三山和五山次之,六山最为少见。清华艺术博物馆的“万物毕照——中国古代铜镜文化与艺术”展中就展出了一件安徽省文物考古所藏的战国六山纹铜镜,镜背的山字纹绕钮右转,形成一个六角形纹,地纹上还有许多圆形的孔洞,推测原来镶嵌有绿松石等饰物。此镜出自六安白鹭洲566号战国墓,直径27厘米,是迄今发现的最大的一面山字纹镜。

除却山字镜,很多铜镜都是以精美的纹饰著称,像汉代的连弧纹镜、草叶纹镜和神兽镜等;魏晋浮雕纹饰的铜镜;唐代的海兽葡萄纹铜镜、瑞兽花鸟镜;宋代的花卉纹镜以及金代的双鱼纹镜等,都是带有时代审美的特色铜镜。

铭文也是镜背上的常见的装饰之一。汉代的铭文镜最有意思,以仪征市博物馆藏的“日日有意”铭瑞兽连弧纹铜镜来看,其上铸铭“日日有意,月有富,乐毋有事,宜酒食,居而必安,毋忧患,美人会,辛(辛)瑟侍,心志驩(欢),乐已哉,固当然。”。铭文含义通俗来说就是每日都有喜事,饮美酒吃美食,不忧虑,与美人相会,听音乐,这些描述的都是世俗生活中最常见的寄望和场景。由此观之,汉代人在对美好生活和事物的追求上,与现代人无甚差别。

宋代的铜镜铭文已然是广告的前身了,其中以湖州石家镜最负盛名。像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展览的一件宋“湖州石十郎真炼铜无比照子”铭文镜,铭文就点出此镜为湖州石家铸造,“石家”作为宋代的名牌铜镜厂商,为防止假冒店铺的行为发生,在铜镜铭文上还特意加铸了“真”,一旁的铭文“炼铜照子每两一百文”则是标明价格。从南宋湖州镜的铸铭来看,一般称铜镜作“镜”和“照子”等,以“照子”最为多见。这缘于宋人的避讳习惯,宋太祖赵匡胤的祖父名曰赵敬,“镜”与“敬”同音,为避“镜”讳,铜镜故多称作“照子”。不过南宋绍兴三十二年(1162年)至绍熙元年(1190年)这段时间朝廷曾规定不用避讳,故而这中间铸造的镜子多还是名为“镜”或“镜子”。

明清之际的铜镜就纹饰的艺术性来看,已经大不如前,像“百子图”等更多地体现出世俗化的品位。铭文如“五子登科”“长命富贵”“状元及弟”等也多是带有吉祥寓意,代表了老百姓最质朴简单的生活憧憬。

从铜镜的发展史来看,各个朝代审美的变迁,艺术风格的流转,在铜镜上便可窥一斑,汉镜的精美,唐镜的雍容,宋镜的秀气,明清铜镜的吉祥如意,都展示着时代留下的印记。

(据《海南日报》)

童趣“小孩模”



“小孩模”是古代用泥烧制的玩具,在山东菏泽地区非常盛行。它又名娃娃模、泥模、火烧模,是孩子们用泥巴做玩偶的陶制图画模范,类似于民间做糕点的印模。有圆形、椭圆形、方形、半圆形、瓦片形等不同的形状。

图中的“小孩模”共有8枚,圆盘形,红陶色,直径约6厘米,厚约1厘米。上面用阴刻、阳刻、浅浮雕等多种工艺雕刻出欢快打鸣的公鸡、疾驰的骏马、浮游的鸭子等动物图案及戴乌纱帽的官员等图像。这些“小孩模”,图案清晰,线条粗犷,简洁明快,生动形象,时代特色鲜明。

据了解,“小孩模”源于唐、宋瓦当,明代成为一种独立的技艺,经民间艺人的世代相传,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。“小孩模”制作上分绘稿、拓稿、雕刻、印模、烧制等工序。每道工序的制作都很严谨。先用铅笔在白纸上绘制出人物、动物、花草等图案,再把画稿拓印在梨木板或半干的胶泥板上,然后用自制的刻刀进行雕刻,雕刻时要注意线条的粗细和深浅变化,主体突出,并有明显的浮雕效果。待雕刻完毕后,再用胶泥翻印,最后将干泥模坯竖立排列装入窑内,用200℃至800℃的温度烧1个多小时,然后停火、封窑,自然降温后开窑取出即可。(据《西安晚报》)

古人的盥洗用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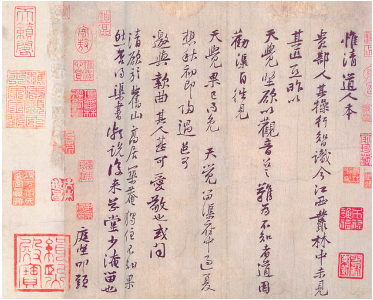


匜为我国古代盥洗注水之器,最早出现于我国西周中后期段,流行于西周晚期和春秋战国时期。匜的形制与现在厨房里用于舀水的水瓢有点相似,腹大用于盛水,一侧有开放的槽流,便于倾倒水流,洗濯双手。有的匜有足,用于支撑稳定,亦有匜底平坦而无足的。匜大多无盖,亦有少量有盖。

图为一件战国铜匜,高6厘米。2005年出土于武汉市蔡甸区沌口战国墓,现收藏于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。器物无盖,短槽流,圆弧底,铺首衔环。口部宽而两沿平窄。槽流口部微向下圈,器壁弧圆,后壁置一个铺首衔环,用于扣手倒水。无足。通体素面无纹。整件器物虽布满斑斑锈蚀,但器型完整,从中依稀可以窥见战国时期的青铜铸造工艺的精湛。

(据《收藏快报》)

黄庭坚行书《惟清道人帖》



《惟清道人帖》页,宋,黄庭坚书,纸本,行书,纵29.3厘米,横31.8厘米。故宫博物院藏。

北宋绍圣元年(1094年),黄庭坚在江西分宁,此帖当书于其年夏日,时年51岁。《惟清道人帖》有峭拔之态,充分体现了黄庭坚行书的特点,为其代表作品。其内容记录了惟清道人的品行及与张商英(天觉)的交往。惟清道人俗姓陈,南州武宁人,为江西隆兴府黄龙寺禅师,北宋政和七年(1117年)卒。

此帖为清官旧藏,鉴藏印有“缉熙殿宝”、项元汴诸印、“仪周珍藏”等22方,半印5方,此帖曾收在《法书大观册》内。曾著录于《妮古录》卷四、《平生壮观》卷二、《墨缘汇观》法书卷上。《三希堂法帖》卷十三可见清代乾隆皇帝曾题赞称此卷“凌冬老干偃蹇岩壑”。(据《人民政协报》)

黄瓜蛔蛔象牙雕



年代:清代中期。质地:象牙。规格:长11厘米,高约5厘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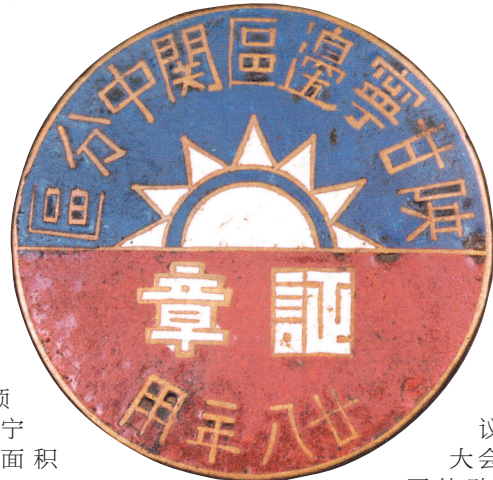
在一截象牙之上采用阴刻、镂雕、圆雕等多种技法雕刻,盈盈一掌可握。但见一根硕大光滑的黄瓜从枝蔓间垂下,黄瓜的头部顶尖带着小花,两只伸着长长触须的蛔蛔悄然出现,一只在黄瓜的叶蔓中探头探脑,一只横置在黄瓜上,似乎在吮吸黄瓜鲜嫩的汁水。

牙为大象身上最坚固的部分,光洁如玉、耐用,珍贵堪与宝石媲美,因此象牙又有有机宝石之美誉。牙雕是指在象牙上进行一系列的雕刻,是一门古老的传统工艺,也是一门民间工艺美术。

黄瓜多子而年年繁殖,瓜庭延绵,象征子孙昌盛,事业兴旺;蛔蛔因极具感染力的鸣叫声受到人们的喜爱,象征着种族兴旺,这二者的有机结合,给这个摆件增加了更多的美好寓意。

(据《内蒙古日报》)

罕见革命文物：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证章



用”(1939年)。1939年7月,关中分区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在陕西旬邑县职田镇上墙村召开,当时有50多人代表关中分区4000多名党员参加了会议。在这次党员代表大会上,选举产生了由习仲勋、张仲良、郭秉坤、张凤岐等13人组成的中共关中分区第二届委员会,习仲勋连任关中分区委员会书记,并兼任关中分区专员。

关中分区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所讨论的议题,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。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,国民政府消极抗日,对陕甘宁边区进行严密的封锁,并不断制造军事摩擦。陕甘宁边区最南端的关中分区东、西、南三面均处于国民党军的包围、封锁之中,关中分区成为反封

乡马栏村等地。关中分区的辖地包括陕西新正、新宁、赤水、淳耀4县全部和旬邑、淳化、耀县、同官(今铜川市王益区、印台区)、宜君、黄陵6县部分领土以及甘肃正宁、宁县一部分,全区面积7000多平方公里。

1941年,受战争影响,陕西省委和关中分区机关单位迁至旬邑县马栏。1943年1月,根据中共中央精兵简政方针,陕西省委和关中分委合并为关中地委。抗日战争时期,关中分区前后召开过两次党员代表大会,分别是1937年10月和1939年7月。

据了解,这枚证章应是1939年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代表所用,所以证章的正面特别注明“廿八年

这是一枚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证章(见图),圆形、铜质,目前仅见甘肃省博物馆藏有一枚,该证章背后所蕴含的历史信息值得关注。这枚证章承载着革命先烈的记忆,是传承、发扬红色革命精神的重要载体,同时也为重现那段革命历史提供了实物依据。

抗日战争时期,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所在地,是敌后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。陕甘宁边区下辖延安、绥德、三边、关中、陇东5个分区,其中关中分区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,战略地位十分重要,它的前身是1934年成立的陕甘边南区。

1936年1月,根据中共中央指示,陕甘边南区改为关中特区,秦善秀任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,习仲勋、张邦英任副主席。

1937年9月6日,根据国共两党关于国共合作的协议,中国共产党将陕甘苏区改名为陕甘宁边区,并成立了边区政府,辖23个县,人口约150万,首府延安。

1937年10月,关中特区更名为关中分区,隶属于陕甘宁边区,习仲勋任关中分委书记,霍维德任关中分区专员,关中分区机关先后驻陕西旬邑县境内的职田镇马家堡、后掌乡阳坡头、马栏